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专题·

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的“第二个结合”^{*}

裴长洪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对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入手,激发了千年传统的社会动力,利用植根于中华土壤的深厚传统互助精神,引导亿万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度和治理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而且鲜明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底色。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吸收了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征的国家经济治理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思想和理论运用了贯通古今的辩证法思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相通。它把种种相互矛盾的事物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求富是中国千年经济思想史讨论的重要话题,而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现“小康”则是中华民族千年传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传统,今天已成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文明传承因素。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包括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要求文明的其他领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生伟大变革。这些方面都离不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 文化传承 “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且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①“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也是未来我们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规律。在经济学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②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民性是相通的,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丰富发展的深厚基础。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

一、从耕者有其田走向社会主义农业:千年传统激发的社会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我国小农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国小农’

^{*}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2024年长城学者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202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第17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农村问题,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产值占近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65%,手工业产值占28%,^②商品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因此,寻找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得不重视农村和农民问题,而解决中国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也仍然离不开农村和农民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

党的二大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和任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开始接触到农村和农民问题。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和“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的口号,说明党开始真正接触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问题。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使一般民主派知道没收土地是不可免的政策,是完成辛亥革命的一种重要职任”。^③这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指示精神是相吻合的,为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需要进行土地改革。但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农村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开始也照搬苏联经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之初,实行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分配的政策。但毛泽东很快发现问题,并逐步纠正“左”的政策。特别是1929年4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同年7月闽西第一次党代会《政治决议案》提出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等具体政策,^④更多地是吸收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化的精华,成为1947年后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旧中国的农村,尽管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但也存在为数不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根据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70%,中农占20%,在贫农中,略有土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50%。^⑤因此,解决土地与农民的联系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不只是没收土地重新分配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考虑到农村中实际的土地占有状态和占人口多数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意愿。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独立的、没有人身依附关系而相对分散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及大中小地主所有制经济,以自然经济为主并附有大中小区域范围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形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形态的内部循环运行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其中,土地制度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破坏了奴隶主占有土地的“阡陌封疆”,造成数量可观的自耕农和小地主,同时在自由买卖土地基础上实现主要由地主占有土地的地主制经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种土地私有制度,逐渐形成了大地主占有多数土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少量土地的基本土地制度。维护这种制度,努力维持这种土地占有状态的平衡以达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一直是封建社会开明的统治者和读书人追求的目标。而这时候,这些呼声“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⑥与切身利益联系最密切的农民几乎是沉默的。

在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中,土地兼并始终是困扰封建土地制度安排的严重问题。尽管屡屡遭到农民起义的打击,但始终跳不出这个“周期率”。孟轲设计的“井田制”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心仪

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293、28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8页。

的理想制度。孟轲“仁政必自经界始”^①的设计思想,是在经界内维持老制度、老办法,而在经界外的“野地”,划出“井田”,以九百亩为一井,公田一百亩,私田八百亩,八家农户分配,各得一百亩。这种以增量解决土地占有不平衡的思路对后来的为政者和读书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土地兼并在汉初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又死灰复燃,董仲舒针对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②的限田主张。限田虽然为儒家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但实际上毫无可行之处,限谁的田,限多少,不仅难以提出具体标准,而且也没有实际操作的政权运作机制,“卒不得施行”。^③到东汉末期,仲长统设计了一种方法,不触动私人已经占有的土地,利用国有荒地使农民“受田”,以恢复农业生产,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并多少缓和豪强地主土地兼并造成的严重社会矛盾。这个设计思想经过三国时期曹操“军屯”“民屯”的实践,到北魏时期,李安世把这个设计思路命名为“均田”,被魏孝文帝接纳而实行。可见,存在国有荒地的增量是维持私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能够长期维系的重要原因。因此,所谓对土地制度三种模式的讨论:复井田、限田、均田,尽管长达两千多年一直是士人争论不休的话题,但真正起过作用的只有利用国有荒地这一条途径,至于它叫什么并不重要。

到了明朝末年,这种只是由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讨论土地占有问题的现象终于结束了。李自成起义打出的旗号是“均田免粮”,中国农民终于第一次发出了自己对占有土地愿望的呼声。这说明,依靠国有荒地来缓解土地兼并的矛盾已经走到尽头了。人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关系,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一直是思想家们讨论的话题。明朝的人口在嘉靖年间已经突破了两千万人,可耕地大约有三亿亩。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都不高,水旱灾害频仍,农业生产十分脆弱,土地兼并不断加剧,北方地区经常出现流民。明末农民战争以及清朝统治入主关内的战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并打击了北方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使清朝的封建经济制度得以延续,但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很快就把清王朝的统治推向崩溃的边缘。到清朝嘉庆以后,是否开放东北这个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让流民垦荒,成为满汉官僚争论的重大决策问题。保守而又占据主流地位的满族官僚的禁垦主张始终占上风。终清代一朝,东北基本是中国未开垦的处女地,直到民国时期,才有了“闯关东”的故事。清朝末年的黑暗统治逼迫农民再次起义,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要求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愿望的呐喊。这个呐喊所蕴藏的深厚伟力,孙中山没有清醒地正确认识到,而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虽然孙中山大声疾呼耕者有其田,并把它作为他的“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但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他犹豫了,企图寻找一种“帕累托”改进方式,即既让农民得到土地,又不让地主受损失的良方。中国共产党遵循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采取的措施是革命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仅此一条就把中国农村搞得天翻地覆,就把几亿中国农民组织动员在自己的旗帜下,就能使武器装备落后、军事技术简单的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瓦解敌军,所向披靡。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胜利。

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国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制经济,实现了中国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根据列宁的理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④因此,列宁主张苏维埃俄国实行农村合作制。中国有着互助合作的悠久传统,它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尚书》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不虐无告,不废困穷”。《诗经》有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文辞优美又寓意深刻,体现了对弱者的怜悯和同情。

① 《孟子·滕文公上》。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05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7页。

③ 荀悦、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4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孔子更是提倡仁爱思想，“泛爱众而亲仁”^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墨子则主张兼相爱，号召“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③在多方面思想资源的滋养下，扶危济困逐步深入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这在汉语的词汇中就可见一斑，诸如“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周急济贫”“济弱扶倾”“轻财重义”“见义勇为”等成语不胜枚举。民间谚语也有很多，比如“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这些成语和谚语口口相传、代代相继，扶危济困的精神也随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不断流淌。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22年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就已经有“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④毛泽东对于不重视农业合作社运动的领导干部的批评，也引用了《论语·卫灵公》的一句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⑤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必定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他的底气，一方面来自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⑥另一方面来自他对中华民族根脉的把握。从1951年底到1957年这短短七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完成了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民族特色。而苏联从1921年到1937年用了整整17年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⑦

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实现了土地公有制，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但是怎样安排土地公有制的具体产权制度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却付出了艰难探索的代价。人民公社制度采取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分配形式，过度集中和僵硬，不适合中国农业精耕细作和灵活安排家庭分工副业的传统，以及广大农民通过劳动激励追求富裕生活的愿望。中国古代农学的辉煌成就，例如北魏的《齐民要术》，元代许衡的治生之学，清初张履详熟习“田家纤悉之务”的农业经济思想，都是在总结几千年中国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对中国农业家庭劳动分工组织合理性的非凡论证。正是吸收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掀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从此，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形成了所有权与承包权相分离的制度安排。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的制度安排吸收了明清时期“永佃制”的合理因素，地主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可以通过地租、抵押、典当、买卖等方法取得土地收益，即“田底权”，但不能取消土地租赁契约，佃户由此获得“田面权”。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人口特别是青壮劳动力进入城镇，农村出现了土地抛荒的现象。相当一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他人经营，承包主体与经营主体分离，顺应这样一种发展现代农业的趋势和农户保留承包权、愿意流转经营权的需要，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势在必行。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集体所有权是根本，农户承包权是基础，土地经营权是关键，这三者统一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它既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需要，也是对中国传统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性发展。

① 《论语·学而》。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页。

② 《论语·雍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4页。

③ 《墨子·兼爱中》。吴毓江：《墨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

⑧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79页。

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调控和治理的中国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①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来就有的历史传统,毛泽东在1933年就号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并分析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预见性地指出:“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②1948年2月,毛泽东对军队发出指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題,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④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济思想,是新中国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治理的指导思想,它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过原则性的天才预想,但在中国之前,只有苏联有比较系统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借鉴吸收了苏联的许多有益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⑤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而且鲜明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底色。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产是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形成的民族文化根源。

在经济思想领域,《管子》是先秦两汉时期关于经济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集大成者,后代思想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和拓展,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化底色的国家经济治理思想,直到今天我们党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吸收了传统文化的许多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打上鲜明的中国特色,创造性地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践内容。

中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很早就产生了剩余产品,为家庭分工和社会分工创造了条件,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生产、家畜饲养、园艺种植的结合,而且存在小农业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经营的结合,因此很早就有商品交换和市场。《周易·系辞》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⑥早期中国出现的“市”多是临时性的交易场所,一般设在“野”或郊外。后来随着城市的兴起,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开始在城市中出现了固定的“市”。春秋和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经济中心和中心市场。《史记·苏秦列传》中描述战国时期齐国临淄的繁盛,“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⑦那时临淄已经是3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到了唐代,东市和西市更是商贾云集,贸易极为繁荣。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宋代都城的商业繁荣景象。明清两代,商品生产和交换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在销售范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14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3页。

⑥ 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6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69),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57页。

围上,又比宋代以前有所扩大。到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已降低到农户只从事种植业不足以维持家计的水平,家庭副业和来自多种经营的收入一般要占到农户家庭收入的40%以上。这使农户与市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农户既是市场上农副产品的出售者,也是市场上盐铁等商品的购买者。一部分生产资料,如铁器、耕牛,以及生活需要的许多产品,如食盐、茶叶、酒和调味品等,都部分需要从市场购买。此外,农民还可能兼做雇工,或短暂性外出从事工商业。据文献统计,鸦片战争前中国每年生产约7.1万担丝,92.2%在市场上出售,生产255.5万担棉花,26.3%流向市场;生产6亿匹棉布,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上出售的,计3.15亿匹,超过同时期英国棉纺织工业在全世界的销售量。^①因此,虽然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它又离不开商品交换和城市经济,两者互相依存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统一体中。而封建社会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治理调控均需要适当地处理这种既互相矛盾,又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

在政治和社会治理上,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必然要求集中最多的经济资源以保障统一和稳定,同时它又是一个头重脚轻的治理体系,由于幅员辽阔和交通不便,官方治理不得不依赖民间治理协同进行,民间治理很大程度是市场取向的。因此,在经济治理思想上,中国早就存在国家集中调控和市场自由放任两种政策主张。《管子》一书几乎囊括了后世所见的所有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思想的前瞻性比起凯恩斯早了两千多年;但是,史学巨著《史记》的伟大作者司马迁却是一个市场自由主义者,也比亚当·斯密早一千多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与亚当·斯密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异曲同工;为了求利、求富,人人都自动尽力,“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②这里,“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不可见之手”。当年司马迁用他对社会的观察,论证市场自由放任的自然性和合理性。尽管《管子》的主导思想是国家调控经济,但它也讲人的利益驱动和市场作用,这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许多思想与方法是相通的。

首先,国家干预经济要从市场和人性的逻辑顺势而为。先秦哲学讲求天人合一,因势利导。反映在经济思想领域,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市场和人性因素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既定前提。一是主张国家的经济政策要以人为本。《管子·国蓄》提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③并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④在这一点上,《管子》与当代我们讲“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⑤是相通的。二是主张国家管理经济要尊重人的主体性。《管子》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⑥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只要因势利导,就能发挥每个人致富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使国家富强。三是主张国家施加政策干预要遵从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无市,则民乏矣”^⑦“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以和而利也,正是道也”。^⑧市场自有运行规律,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管仲还主张以法治理经济,以严格的交易法规来规范市场,为市场竞争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

其次,国家干预经济的目标古今通义。古代先贤,无论管仲、桑弘羊、王安石,对于国家干预经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15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129),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54页。

③ 《管子·国蓄》。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0页。

④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1页。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⑥ 《管子·禁藏》。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91页。

⑦ 《管子·问第》。黎翔凤:《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4页。

⑧ 《管子·问第》。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49页。

济,或重农或重商,其治国理念都是为了富民强国。但具体到经济和市场管理:一是为了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管子·乘马》言道:“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①只有市场流通稳定,才能百利得、百事治。所谓百利得、百事治,也就是民可由之富了。二是为了保持国家有充足的财力,以实现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一旦封建国家财力受到大地主、大官僚的侵蚀,国家干预经济或经济改革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基本理念和手段。三是为了调节贫富差距,保持政治稳定。《管子》认为,国家之治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②因此,他主张国家管理经济要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散积聚,钧羨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③当然,所谓“散积聚、分并财利”也主要是指限制和防止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以及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这些国家干预经济的指导思想比凯恩斯经济学更具有合理性,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家经济职能作用均具有启示性意义。

再次,构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其一,财政政策,包括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自秦以后,中国历代王朝不管是否做到,儒家主流思想至少在名义上都公开主张轻徭薄赋。西汉初期实施与民休养生息政策。《管子》主张“薄税敛,毋苟于民”^④“府不征货,藏于民也”^⑤和“取于民有度”。^⑥这些主张都规劝统治阶级要谨慎处理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关系。《管子》还主张只征正税,不向百姓强索农业税以外的杂税和劳役,且执行“寓税于价”的政策,将山中的铁、海里的盐进行管制,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即“官山海”,^⑦对盐铁适当加价,将税负转嫁到盐铁等垄断商品的价格之中。表面上,没有征税,实际上“人无以避此者”,不得不“服籍”。^⑧对于农业税,实行“相地而衰征”^⑨的差别税率,使百姓税负更加公平。《管子》还发现了国家支出的经济功能,“若岁凶旱水沴,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⑩这就是鼓励通过奢侈消费来扩大社会需求。《管子·轻重甲》还提出了社会救助的思想,通过“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泔之,虚者实之”,对贫者“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增加政府救助措施,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⑪后世历代王朝都继承了这一经济思想。比如,北宋蔡京为相时,为了解决穷人看病问题,建造了安济坊;为了收纳鳏寡孤独,建了居养院;为了安葬穷人,建了漏泽园。这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

其二,货币政策。秦统一六国后,就把铸造钱币权归于中央政府,秦国的“秦半两”流通于统一后的六国,开始出现类似于现代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管子》提出,“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⑫要求把铸币权控制在国家手中,并认识到物价与币值的关系——“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⑬要求政府严格控制金属货币发行量。为此,中国古代还发明了统计和计算货币流通量的方法。南宋时期,发

① 《管子·乘马》。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4页。

② 《管子·国蓄》。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0页。

③ 《管子·国蓄》。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0页。

④ 《管子·五辅》。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9页。

⑤ 《管子·权修》。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

⑥ 《管子·权修》。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

⑦ 《管子·海王》。黎翔凤:《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49页。

⑧ 《管子·海王》。黎翔凤:《管子校注》,《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47页。

⑨ 《国语·齐语》。徐元浩:《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7页。

⑩ 《管子·乘马数》。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51页。

⑪ 《管子·轻重甲》。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89页。

⑫ 《管子·轻重乙》。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60页。

⑬ 《管子·轻重甲》。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94页。

明了“称提”之策,在防止纸币贬值方面进一步丰富了《管子》关于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思想。《管子》提出的轻重之术,实际就是中国古代版的逆向公开市场操作,即“以重射轻”(贱时买,囤积居奇),或“以贱泄平”(重时卖,平抑物价),来达到稳定物价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北宋王安石变法,进一步提出了推行国家赈贷及免息措施为灾民提供救灾资金和粮食,依稀也有几分现代货币政策的雏形。

其三,价格政策。一是平准法和均输法。《管子》认为,“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①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范蠡和《管子》中的平准思想,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法。王安石变法采取的均输法,通过改革首都长途采购贩运物流体系的办法,平抑物价并减少物流成本,此外,还通过常平仓担负“青苗法”实施的功能。后世王朝多数都在大灾之时,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常平仓制度至清初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管子》还发明政府通过掌控部分货物平抑物价的办法,“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②“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③和“天下高我下”^④的对外物价政策,分别用来保持本国物价稳定、对外商品出口和吸引稀缺物资进口。

纵观中国历史,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中,不仅存在它对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功能以及自发运行功能,而且还存在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思想和丰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党的经济管理思想的创新发展,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还与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连。

三、从“变法”到“改革”:贯通古今的辩证法逻辑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出现了多次由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和发动的“变法”或“革新”思想和实践,试图通过调整封建经济关系和政策达到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现象。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已经建立起来,它与生产力发展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又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相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由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基本理论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思想和理论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同样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现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自然与古代不同,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措施自然也没有通用性,简单地类比也容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但是古今辩证法的思维逻辑是相通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一语道破了改革的辩证法思维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把公有制经济与多种经济形式结合在一起,把资本的积极因素与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在一起,把种种相互矛盾的事物结合在一起,正是对立统一辩证法思维的实践运用。这在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中有大量论述。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辩证法著作。周易文化,本质上就是阴阳辩证法,这也是辩证法最纯粹的部分。毛泽东的《矛盾论》就吸收了《易经》中阴阳互为对立统一的元素。后世孔子作《易传》《十翼》等,发扬光大了周易文化,使之成为“群经之首”。儒家的很多文化中,都有周易思想,也充满了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0页。

② 《管子·地数》。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84页。

③ 《管子·轻重乙》。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05页。

④ 《管子·地数》。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84页。

阴阳辩证法。例如,孔子的学问建立在“天地人”三者结构中,设立了两种人格,即“君子和小人”。“君子”和“小人”就是一对矛盾,这两种相反的人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种人格都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然后他又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大同世界”。

要实现“大同世界”,就离不开“君子”和“小人”,没有了“小人”,还需要什么“君子”呢?没有“君子”,又有什么“小人”之说呢?没有“君子”和“小人”的矛盾对立,斗争发展,社会又如何进步呢?又如何实现“大同世界”?就整个儒家文化来看,走的是积极入世的道路,主张改造社会;周易文化的另外一个支流,即道家文化,则从出世的消极方面来理解辩证法。老子系统揭示了事物互相对立、依存、转化和往复的关系。老子常用的词组如有无、虚实、强弱、刚柔、雌雄、祸福、善恶、美丑、长短、高下、前后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不能存在。他体察到事物的矛盾会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①是事物运动的规律。

老子的《道德经》中的辩证思想是最明显的,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②这就是告诉我们,要辩证看待一切。他还进一步提出一切事物都要向它的反面转化的观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③“曲则全,枉则直”^④“物壮则老”^⑤等。意思就是,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要顺应它的客观规律性,要相对看待。这种思想的本质就体现了周易中“阴阳辩证”。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双方不仅是对立统一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相互转化的趋势。正如《道德经》中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⑥意思是说,宇宙间的事物尽在往复变化之中,由此推出一条法则,物极必反,剥极必复。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都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话语。虽然,世界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汗牛充栋,典籍浩如烟海。但当我们去寻找它们的根源,去触及这些思想的底层逻辑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都有相通之处。它们的本质是相通的、相同的,是贯通联系的。不同的是形式和描述方式。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周易、儒家、道家、禅宗都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一部辩证的文化,是实践出真知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是有内在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辩证唯物论”和中国文化“阴阳五行辩证”思想不谋而合。同时,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实践观”又和中国人注重实践劳动的价值观契合,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能融入中国本土开花结果。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在中国扎根相同,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辩证思维两者结合的产物。“天人合一”思想历史渊源悠久。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儒家以及杂家等都有朴素的论证,成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滥觞。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最先对“天人合一”的观念进行阐释,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认为天、地、人三者密不可分,人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发展,达致“物我为一”的最佳状态,就必须遵循客观自然规律。道家的另一大代表人物庄子则从“物无贵贱”“万物一体”的视角,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主张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应顺天行、循天理、合天德,按照自然法则的基本规律办事。儒家同样主张人与自然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反对将二者割裂对立。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中把对人的道德关怀——“仁爱”倾注于自然之中,强调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应按照“天行有常”的自然客观规律,“制天命而用之”,即根据具体情

①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0页。

②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页。

③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1页。

④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5页。

⑤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页。

⑥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页。

⑦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4页。

况,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论语·述而》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①孟子建议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②荀子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③这些都表达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遵循时令、用物有度、不违反自然规律等朴素思想。

《吕氏春秋》继承了儒家“取之以度,用之以时”的用物原则,强调“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④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将眼光放长远,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西汉时期,董仲舒在吸收春秋战国时期各派观点后,提出“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等观念,认为自然万物规律虽有其“不可违性”,但人和自然具有同样的“形体结构”。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环境时,应“法天道”“顺天命”,通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解并掌握万物的运行法则,以使自身的行为处事方式符合“自然之道”,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合而为一”。^⑤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张载等人在吸收唐代“众生平等”观念的基础上,沿着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路径,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⑥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人类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应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至明清,王阳明进一步明确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⑦清代理学大家孙奇逢也有“天人一体”等见解。可见“天人合一”思想早已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影响深远悠久,成为中国古代先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规范和指导性思想。随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历代先贤和统治者根据“天人合一”思想中用物以时、节用有度等原则和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社会实际情况,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天人合一”思想也长期贯穿于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拉开了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改革开放后,随着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成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局等行政职能部门,确立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动地阐释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破解了保护环境资源与实现经济增长协同的难题,蕴含着丰富的东方传统生态文化智慧,既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为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四、小康目标:求富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邓小平总结新中国前30年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他主张追求小康经济社会目标的实践和理论依据。求富也是中国千年经济思想史讨论的重要话题,是研

①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8),《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6页。

② 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4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5页。

④ 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9页。

⑤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95—2526页。

⑥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6页。

⑦ 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9页。

⑧ 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日。

究经济的基本问题。从个人来说,富是身份、地位和荣誉的基础;从国家和社会来说,富是国力和秩序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是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谈论求富问题,其内涵就是百姓的“丰衣足食”“家给人足”,并能提供剩余产品供养统治阶级(养君子)及其国家机器(“足君”“足国用”),实质上就是把简单再生产维持社会的生存作为求富的目的。古代知识分子所抱负的“致君尧舜、使民小康”,就是达到这个目的。一些思想家比较重视求富中的剩余,认为求富就是力求要有多的剩余,以形成“公私之积”,^①就是在国家和民户两方面都有储蓄。但是,这种积累不是生产性积累,而是用以防范自然灾害,所谓“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也都是为了备荒。这仍然没有超出简单再生产的农业社会的求富的界限。到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外来侵略、掠夺和奴役,痛感中国的经济社会停滞落后是一切苦难的根源,因此更加把求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并赋予求富以完全不同于过去历史的新内涵。

从理论上说,近代思想家的求富已经转变为以扩大再生产为基础的创造财富的活动,是一种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经济思想。这种求富已经不能使用中国几千年的“旧法”,而要采用“新法”和“西法”,也就是“导民生财”^②的方法。为此,要引进西方国家工业生产以及大生产的组织、经营形式。严复用传统的“奢俭”范畴来说明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认为俭所以可贵,是因为俭可以“有所养”“有所生”,否则,就不仅不可贵,而且是“财之蠹贱”。^③他所说的“有所养”“有所生”的“俭”,是指把消费节余下来的财富积累起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基金,进行资本的增殖,也就是以扩大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儒家学说总结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基本教训就是,立国如不能解决求富问题,那就必然“四海困穷,天禄永终”。^④中国封建王朝代代兴亡的历史,都为这个客观规律提供了胜于雄辩的经验证明。但是,在中国近代尽管许多仁人志士为中国求富付出了毕生努力,却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阻挠和镇压,难以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轨道,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种统治,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根本的政治前提。而解决根本政治前提的意义就在于,保证实现人民和国家的求富愿望,实现民族的复兴。因此在根本的政治前提问题解决之后,求富和发展的愿望就变得更加迫切和突出,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的现实依据和中华民族千年传统文明的历史依据。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是融合共通的。中华传统文明说的“富安天下”^⑤“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⑥“礼义生于富足,而盗窃起于贫穷”^⑦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具有内在的契合点,这些文明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同成为今天我们创造新文明的思想来源。

当代我们所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在求富问题上,是要追求14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思想文明中的闪亮之处。古代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家讨论求富,无论求富的生产方式基础是什么,都特别重视研究为谁求富,使谁致富的问题。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受此影响,古代儒家知识分子通常认为,求富的次序应当是:首先要富国,因为国家代表整个民族;其次是富民,就是使百姓普遍富裕,做到“家给人足”;再次是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8页。

② 薛福成:《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326页。

③ 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9页按语。

④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1页。

⑤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0页。

⑥ 《管子·牧民》。戴望:《管子校正》,《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⑦ 王符:《潜夫论笺校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富君,即让国库充足,以保证国家机器和统治集团“足财用”;最后才是富家,即增加个人或私家之富。尽管现实情况与此大相径庭,但儒家思想的坚持正是对现实贫富不合理的抗议。传统经济思想一般都把富国看作是经济问题研究和实践的首要问题。正如“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①所谓富国,即整个国家的财富总体增加,这是其他三个求富主体增加财富的前提。一国财富总量不变,其他三个求富主体的财富变化只能此消彼长。把百姓富裕作为财富增长的来源,是国库收入的基础和保证,是儒家思想的主张,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②“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③对于富家,即对于个人追求财富,传统经济思想的主流观点是倾向限制的,因为这些人多数是司马迁说的“奸富”,即贵族、官僚以权谋富,或是官商勾结垄断市场谋富;再则是大地主兼并土地,鱼肉乡民谋富;还有恶霸、匪盗等靠邪恶手段致富。如果社会听任这些人富家,那就必然“损民贫国”。^④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种国家本位的经济思维逻辑,在表达形式上也是以富国之学的面目出现,这个传统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人生抱负是分不开的,它也必然产生一种局限性,这就是对于微观组织的经营管理以及如何提高生产单位的生产效率这类问题不太关心。因此,它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相结合,才能使我们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合理的养分。

今天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个人求富的正当性给予了充分的激励,但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求富,也有一个道德伦理的规范问题。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性来自中国古代以简单再生产或以人口、土地扩张为基础的粗放扩大再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导致生产规模年年简单重复,没有增长发展,所以“宇内之财,只有此数”,^⑤肥私就必然损公或损民,因此不提倡私人致富。这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当代,对于“奸商”的抑制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作为普遍的原则它是有片面性的,它不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最终也不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在今天要把这种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以义取利”,鼓励人民去争取自己正当的、有利于社会的个人利益。这里就牵扯到经济伦理问题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讨论求富问题时常常把它与经济伦理联系在一起,即讨论义利关系问题,应当说这在今天也仍然是需要的。孔子的义利观是明确的,《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重于利,在义利关系中孔子主张义主利从。但是它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孔子说的“君子”,指的是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只应该关心国家治道和教化;小民百姓可以只关心自己的生存利益,它的矛头是对着那些新兴的地主阶级及其势力的代表,他们无视原来的利益秩序,谋求新的私利,因此是“小人”。后来,随着封建地主制经济制度的确立,儒家学说接过了孔子的义利观并发展为贵义贱利论,但其内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说的是一切都要维护大地主、大官僚的地租、高利贷剥削的既定秩序,即“义”,反对一切的调整和改革,把一切改革和调整都说成是与民争利,是不义。因此,历史上的改革思想家都不得不煞费苦心重新解释儒家的义利关系。王安石提出“以义理财”,说“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⑥南宋叶适批判儒家贵义贱利的教条是“以义抑利”,^⑦他把“利”看作是“义”的物质内容,“抑利”的结果将使“义”成为空洞的说教。所以“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⑧他针对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评论指出,“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

①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3页。

② 《论语·颜渊》。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8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5页。

④ 王符:《潜夫论笺校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页。

⑤ 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08页按语。

⑥ 梁启超:《王荆公》,《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0页。

⑦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6页。

⑧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4页。

然利是义的物质内容,二者就不应互相排斥,不应“以义抑利”,而应“以利和义”。^①义利统一、义利兼顾思想也是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传统,但这不仅在封建社会做不到,即便在“西法”方式生产条件下也难以实现。因此,儒家学说只能停留在反对“不义而富”层面上,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教义。主张“西法”的近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即使“西法”普及,“导民生财”的结果只会“利归富商”,^②仍然担心由于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因此,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在积极寻找能使中国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发现一种贫富差距不太大的调节方式。严复提出了“无甚富,亦无甚贫”的构想,谭嗣同关于先富后均的主张,孙中山关于“救贫防不均”的思想,都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根脉,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追求共同富裕目标的文明基因。

五、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中的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包括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要求文明的其他领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生伟大变革,呈现新的形态。这些方面就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一)新质生产力创新思维中的“两个结合”

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新质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的跃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关键性技术实现颠覆性突破、发生质变,必然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从而产生新质生产力。当今新的物质生产力,正在信息化、智能化等条件下形成。它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它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实现了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新质生产力的载体是产业。当今光伏、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都是从曾经的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来。因此,“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有“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章,其中一节是“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当然,新质生产力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那些实现了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质生产力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③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创新求变的重要性,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的盘铭上就写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老的经典《易经》强调变易的意义,如《杂卦传》指出《革》卦和《鼎》卦的主旨:“《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解释《贲》卦的《彖传》言:“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传》也说:“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④古代中国儒、释、道三家传统文化,在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都继承了《易经》的变易思想,总能应对时代的挑战,适时进行调整和革新,从而绵延不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是如此。在马克思的年代,马克思就注意到生产力的各因素中,除了劳动工具之外,还存在劳动者提供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马克思还说,“在这些生产力

①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86页。

② 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页。

③ 习近平,202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第17期。

④ 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4页。

中也包括科学”，^①“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②列宁注意到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大意义，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这些说明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成分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不仅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加快体制机制变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完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这些变化也必然影响到上层建筑领域，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起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新形态。然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同样需要从文化传承中得到本土的营养成分，这至少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 在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主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民主不仅是近代先进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点。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做好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民本思想在中华文化史上源远流长，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民本是最耀眼的思想明珠，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包含三个深刻的内涵：

第一，回答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一直认为国家权力的合理性是为民。《荀子·大略》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③上天立君使之获得政治权力，这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但“天之立君”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因此，“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④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⑤“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民本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回答政治权力上天授予的合法性之后，要解决“为民”的合理性问题。

第二，回答了国家政治的基础是什么。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均认同民众是国家体系的基础、政治稳定的条件。《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敬，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⑥统治者要认识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即如孟子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⑦尽管他们也相信“天”“天命”，但是他们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⑧“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⑨也就是说，最终决定国家体系、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人民。孟子也总结了反面的教训：“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⑩西汉贾谊对人民与国家、国君、官吏的关系，以及施政得失、国家兴亡、战争胜败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③ 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4页。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3页。

⑤ 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72页。

⑥ 孔安国：《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0页。

⑦ 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95页。

⑧ 王夫之：《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页。

⑨ 孔安国：《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93页。

⑩ 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95页。

了全面论述,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也”。^①

第三,回答了执政者的目标是什么。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②也就是说,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比尧舜还强的圣人。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④这相当于现在的民主政治,就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这就是惠而不费的事情。历代儒家思想家都主张执政者应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必须确立的执政目标。这种传统文化代代相传,形成中国民主政治广泛的社会认知:“天下大势,常系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官之道,先存百姓;执政之要,顺乎民心”;“百姓与之则兴,百姓非之则危,百姓悖之则亡”;“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天下大势,民心所向,天下归之;党群同欲,天下无敌”;“政之所兴、在悦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总之,民本思想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约束了政治权力和顺应了民意,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的世界典范,是今天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文明形态的民族胚胎。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存在重要缺陷,最突出的两点:一是它仍然是“君权神授”的历史唯心主义,把国家权力看作是上天授予的,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即强调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二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于如何落实以民为本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权力制约及其制度设计的方案和步骤。提倡民本思想的士大夫和思想家更多关注的是以思想道德来解决政治问题,空谈“仁义”,而没有从权力制约及其制度设计上落实以民为本的主张,故而大大削弱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政治作用和历史影响。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明确了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人民的幸福和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同时,中国的政治建设又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吸收、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构建科学合理的政治体制和制度体系,就能把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贯彻到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人民”都是最突出的关键词。他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⑤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观念的当代价值,也是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契合与融合。

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⑥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构建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支撑作用。社会治理亟须我们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现实社会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身份的认同感,增强人民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归属感,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深厚的社会治理理念。古代思想家们在社会治理理念上有“天道”治理、“霸道”治理和“王道”治理三大流派。“天道”治理理念本质上即道

① 贾谊:《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8页。

② 《论语·雍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3页。

③ 《论语·学而》。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页。

④ 《论语·尧曰》。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1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

⑥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5日。

家治理理念。它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人们首先要认识“道”,即认识万物的本源和宇宙的运动规律,只有掌握了“道”,才能遵守“道”,依“道”而行。老子的治国理念,要求统治者和人民在行“道”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减少个体的盲目思维,注重理性思维,从治身推及治国,增强人民对自然、对宇宙万物规律的尊重,促进个人和国家、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而实现身国同治的目的。提倡以“道”治国,在“道”的基础上,依照其遵循自然的特性,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在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的思想中,“道”是无为的基石,但“无为”并不是具有消极意义地让统治者什么也不做,而是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时候要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不妄为,百姓不乱为,敬畏自然,顺应发展变化,最终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发展。

“法自然”“无为”“无事”,在经济政策上体现为国家自由放任和不干涉,在西汉初期成为“与民休息”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今天我们尊重市场在决定资源配置和处理政府作用关系上,可以吸收道家的治理理念,纠正政府作用的“错位”和“越位”。在社会治理上,可以吸收它的合理因素,克服政府在社会治理上包办一切的片面方法。提倡走群众路线,扶持来自群众的自治理念和首创精神,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和提高,形成有组织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霸道”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当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子。他强调由于人的自私本性和利己动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①从人性自利论和人际关系冲突论出发,韩非子主张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当加强“集权统治”和“权威政府”的作用,才能防止个人私利和欲望的膨胀,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他继承总结先秦法家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治理理论。其理论依据是:人口和财富的增加,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了社会竞争的加剧,进而使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封建社会君民矛盾和君臣矛盾增多,因此必须采用法家“法、术、势”为核心的集权治理。“抱法处势”“术以知奸”,^②主张严刑重赏和权威震慑的治理方式,形成了古代封建社会依法治理与集权管理模式相结合的动态社会治理理论。

依法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可能没有依法治理,也不可能没有对于侵犯公民权利、损害社会和个人利益犯罪行为的震慑和打击。依照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并使人们知法、守法,使全社会处于法治精神的约束下,这就是“抱法处势”;同时,通过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政法机关的专业工作,达到防微杜渐,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从而达到社会安定,人民安全的目的,这就是“术以知奸”。可见,法家的霸道治理思想中也有我们今天可吸取的有益的治理理念。

“王道”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强调“自上而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治理秩序,以德为本(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关系准则;以及个人从内而外、从心理到社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身修炼升华方式,形成完整的迄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治理理念。儒家以道德建构为治理根基和力量源泉的理念、“以德治国”的施政主张以及以教化培育社会精神的实践路线,在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中产生了强大的作用和效果,弥补了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落后的缺陷,大大节约了社会治理和行政治理的成本,维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古代中国生产力发展推向世界的顶峰。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治理理念有许多契合点。例如,我们倡导公正、法治和爱国,与儒家的治理秩序是相通的;倡导民主、文明、和谐、平等、敬业、诚信、友善,与儒家的社会关系准则是相通的;儒家的忠孝思想也是当今全体人民献身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力量,以及每个人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思想根源。传统思想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化作用,对于当今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教化人心,这是社会治理的首选途径。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社会治理的对象都是人,

①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9页。

②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8页。

只有人好,社会治理才有坚实的基础。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并给以现代化的诠释,对于我们加强人格塑造和思想修养,从个人修养到社会治理乃至治国管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

3.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中华文明对于事物从多样性、差异性进而产生创造力有深刻的理解。差异性和多样性,造就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力量,只有融合多样性的东西才能够产生新的事物。在《国语·郑语》中记载:“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①就是说,和谐能够产生新事物,但一味求同不能持续发展。只有“和而不同”,才能最广泛地凝聚和发挥一切智慧和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对待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理念。在国家关系上,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以和为贵”。这种“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尊重、感恩、圆融的表现。“和而不同”的特点是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构成“和”的途径。这种“和”的方式是在一分为二基础上的合二为一,和而不同基础上的求同存异,良性竞争基础上的奋进创新,我为人人基础上的人人为我。这是一种“和”的哲学,是“会通”:有包容,更有择优;有融合,更有贯通;有继承,更有创新。最终形成“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②的“和”的佳境。在春秋诸侯争霸中,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③在孔子看来,齐桓公多次会盟诸侯(以尊王攘夷),是以“仁”而霸,不是以武力来制衡各方,形成和平的治理秩序。

“和而不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未挑起冲突、侵占他国土地、发动代理人战争或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中国是全球和平纪录最佳的大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的是人民的勤劳和对和平的维护。和平发展已写入执政党党章,中国也是唯一将和平发展写进宪法的国家。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胁迫、不谋求势力范围,与各国和平共处,为全球战略稳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不是为了说服、取悦或安慰别人,而是基于国情、文化传统、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战略抉择。

“和而不同”,也是应对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智慧选择。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④中华文化文明的力量就是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来观察和应对世界。这是文化的智慧,文明的大道。传统的大国主导国际秩序正发生变化,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使国际关系走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这是以中国发出的“文明倡议”为引领思想的历史趋势。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为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和平与稳定。“斯为美”、最为贵的“和而不同”之道蕴含着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中华民族既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立自强的精神,也具有立己达人、分享各方的愿望。古丝绸之路和郑和七下西洋,都是把和平之风吹向世界的佳话。当今中国吹向世界的和平之风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引导全球化的理念,需要寻找“转化冲突”的和平途径,需要跨学科、跨国界的国际关系和平学问和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呼唤共行天下之大道:主张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和而不同”这一和平文化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必将照耀在人类发展的前进道路上。

① 徐元浩:《国语集解(修订版)》,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第472页。

② 出自冯友兰先生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2014年6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有引用。

③ 《论语·宪问》。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1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5页。

“Second Integration” in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I Chang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upholds and develops Marxism, emphasizing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the bes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Only by taking root in the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oil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can the truth of Marxism flourish here. This represents the foundational experience and essential rule summarized by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regarding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by the CPC over the past century. In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how do we embark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The CPC initiate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unleashing the social momentum rooted in millennia-old traditions, and harnessed the deeply embedded spirit of mutual assistance inherent in Chinese culture to guid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rmers on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sorbed both the theoretical insights of Marxism an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while preserving the core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PC has integrated distinctively Chinese cultural features into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uch as people-oriented approach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and market freedom, and such policy tools as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for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The reform ideology and theory of the CPC embody a dialectical approach that connects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demonstrating a deep affinity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PC has effectively harmonize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public ownership with various forms of ownership, 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capital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market-driven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 strengthened government functions, organically unifying various contradictory elements and thereby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institutio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e of the key conclusions drawn by Deng Xiaoping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at poverty is not socialism. This served as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his advocacy of achiev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s an economic objective. The pursuit of prosperity has long been a central theme in China's millennia-long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ollow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prioritiz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moderate prosperity represent the continu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thousand-year-old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The concept of attaining both prosperity and equality, which is rooted in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has today become a cultural inheritance factor driving the pursui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chiev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foster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ntails not only the advancement of highly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across other domains of civilization, production relations, superstructure, and ideolog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innovative. The creativ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termines that it upholds tradition without clinging to the past and respects ancient wisdom without reverting to archaic thinking. It also determine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fearless in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embracing new things. These aspects are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new civilization for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must draw nourishment from the cultural heritage, encompassing at least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 incorpo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rd, apply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to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CPC; Cultural Inheritance; “Second Inte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N01, P20, A13

(责任编辑：刘洪愧)(校对：何伟)